

# 文化形态史观与战国策派的史学

张和声

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曾在西方名噪一时，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几个中国学者首先向国内介绍了这种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对中外历史文化，现实政治大发议论，形成颇有影响的“战国策派”，从而在现代政治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留下引人注目的一页。对此派人物的是非功过，现代政治思想史的教科书早有定论，本文仅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考察一下他们是如何接受和应用“文化形态史观”的。

## 一、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有关文化形态学的论述

文化形态史观又称为历史形态学，它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历史，比较各个文化体系的异同，从中归纳出共通的形态和模式。该学说的始作俑者是德国的哲学家斯宾格勒。1917年12月，斯宾格勒抛出《西方的没落》一书，对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发起了猛烈评击，以一种全新的体系重新评估世界历史。他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有八种自成一体的文化，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玛雅文化、伊斯兰文化及西欧文化。每一种文化都犹如生命的有机体，必然要经历兴衰盛亡的生命周期。在斯宾格勒看来，前七种文化已经死亡或僵化，西欧文化同样在劫难逃。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点，他把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指出人类历史表现为若干种不相同的文明，各大文明都要经历发生、成长、崩解和死亡五个阶段。他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特征来构造其文化演变的模式，认为希腊世界在文化上属于同一体系，各城邦的公民具有文化上的认同感，在政治上则处于分裂状态，各邦国之间竞争激烈，战乱频仍。竞争固然能激发人的创造力，促进了文明的繁荣，但战争愈演愈烈，对社会的破坏也日益严重。罗马的统一带来了和平与秩序，暂时延缓了文明崩溃的进程，但统一的代价也极

其昂贵：连年征战已使各城邦国力虚耗，在大一统帝国僵死的制度下，人们生机勃勃的创造性受到窒息，整个社会逐渐失去活力，大一统帝国也势必难以维持长治久安的局面。少数当权者依靠武力来加强统治，导致国内人民离心离德，对毗邻的蛮国也失去了吸引力，前者形成内部无产者，后者成为外部无产者，帝国处于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窘境。内部无产者从外来的宗教思想中获得灵感，创立高级宗教——基督教，在精神上独树一帜。随着基督教势力的上升，整个社会和外来蛮族都皈依了基督教，大一统教会便应运而生。蛮族的入侵给予日薄西山的帝国以最后一击，帝国的垮台标志希腊文明的衰亡。汤因比由此得出结论，各大文明在衰落期无不经历大一统帝国、大一统教会、蛮族入侵这样的过程。显然，汤因比的研究重心放在文明的衰亡期。

汤因比在理论上与斯宾格勒是一脉相承的，但汤因比反对斯宾格勒的宿命论，认为文明的灭亡并非命中注定的，强调人的精神自决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摆脱文明灭亡的厄运。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理论在西方曾引起很大的反响。

## 二、战国策派的“史论”与“时论”

所谓“战国策派”，主要由西南联大的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组成。1940年到1941年间，他们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1941年底又在重庆的《大公报》上辟出《战国》副刊，他们在这些报刊上系统介绍了“文化形态史观”，鼓吹“战国时代重演”论，时人称之为“战国策派”。事实上，在此之前，雷海宗已在清华大学刊物《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系列以文化形态史观为指导思想的论文，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名为《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1946年，大东书局出版了林同济、雷海宗的论文集《文化形态史观》。他们的这些言论在思想界引起了争议。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正是抗战的严峻时期，战国策派公然宣称：“抗战是一个有力量的伟大现实，它一面赋予我们以一个建设学术的机会，一面也派定我们以一个建设学术的责任。”而要建设学术，“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为是‘历史形态学’。”因此，他们刻意以历史形态史观为历史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林同济表示，斯宾格勒用这种方法写出了《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

究》也是这方法的另一种应用结果。战国策派则要借用这种学说，来使国人。再建起‘战国七雄’时的意识和立场，一方面来重新策定我们内在外在的各种方针，一方面来仔细评量我们二千年来的祖传文化！”

且让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如何重新评价历史的。

林同济将文化的演进划分成封建、列国、大一统国三个阶段。雷海宗则将其分为五个阶段，即封建时代、贵族化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和文化灭亡的末世。虽然一个分为三段，一个划为五段，实质上大同小异，汤因比历史模式的痕迹在这里显而易见。雷的前两个阶段等于林的封建阶段，雷之刘二阶段，相当于林的大一统帝国阶段。他们归纳出每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列国阶段”或谓“帝国主义阶段”的评析，显然是他们的重点所在。

林同济认为，在列国阶段出现两大潮流，一曰“个性的焕发”，一为“国命的整合”。“个性潮流”表现为庶人入仕、民众入伍、商人活跃、宗教信仰放任等等，百家争鸣则是这股潮流的象征。“国命潮流”的具体形态表现为政权集中、宗教统一、经济干涉、国教创立，思想渐趋定于一尊。

个性潮流代表“创造冲动”，国命潮流代表“秩序要求”。在列国阶段的前期，个性潮流略占上风，国命潮流则后来居上，事实上国命潮流始终是这个阶段的主题。

林同济套用中国历史名词，又将列国阶段的前期称为春秋，后期称为战国。春秋时期，贵族遗风犹存，个性得到张扬，文化的发展趋于顶峰。战国时期则一切以“战”力中心，贵族传统荡然无存，文化开始走下坡路了，用雷海宗的话来描述，。经过短期间思想自由的阶段之后，焚书坑儒一类的办法渐为常事。与国家政策不合的文字，对于当权者不利的文人学士，轻则被弃、被逐，重则被毁、被戮。在思想方面，这是一个回光返照的时代。短期之间，百家争鸣在表面上似乎非常热闹，但思想趋于派别化，伟大的创造思想并不多见。最后连派别化的思想也趋于消沉，只剩下毫无中心见解的杂家，东拼西凑的光写许多杂乱无章的大书。”社会也

就步入了大一统的阶段。在大一统阶段，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太平”。文化陷入一种与时俱增、无法自拔的“倦态”，“不求向上升高，不求向外膨胀，焚

香祷祝，只求天下无事”。文明也就陷入僵化，走进了死胡同。

林、雷对历史文化的论述显然受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影响，林同济自己也承认，“我和雷先生的这些文字，多少是根据于形态历观的立场而写作的”，“应用这种方法而有卓著成绩的恐怕是雷海宗先生，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小书，国人应为注意。。因此，林同济将雷海宗称为“中国学界中第一位形态历史家’。

雷海宗在《中国文化的两周》一文中，首先从历史分期着手，批驳了传统的上古、中古、近代三段论世界历史划分法。他指出这种分期法乃一元的直线历史观，而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元的，用三段论来划分世界历史显然与世界历史不符，而将这种分期法搬来限定中国历史则更为荒唐。他用埃及文化、希腊罗马文化，欧洲文化作为例证，来阐述他的形态历史观，进而指出：“一切过去伟大文化都曾经过一度的发展，兴盛、衰败，而最后灭亡，唯一的例外是中国。”从而提出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的观点。

雷以公元 383 年淝水之战为界，将中国历史分为二大段。他认为 383 年之前纯粹是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黄河流域为政治文化的重心，外来的血统与文化的地位无足轻重。他将这段时期称为“古典的中国”，又按照他的形态史观将这第一周文化细分为五个时代：

- (1)封建时代，公元前 1300 年——前 473 年；
- (2)春秋时代，公元前 770 年——前 473 年；
- (3)战国时代，公元前 473 年——前 221 年；
- (4)帝国时代，公元前 221 年——公元 88 年；
- (5)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 88 年——383 年。

第二周文化起自公元 383 年，此后中国文化不再是当初的纯粹华夏族的古典中国文化，五胡乱华，印度佛教的巨大影响，使中国文化发生极大的变化，成为“胡汉混合、梵华同代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中国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以说个性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了重要的地位。”他将第二期文化也分为五个时期。

- (1)南北朝、隋唐五代，公元 383 —— 960 年；
- (2)宋代，公元 960——1279 年；

- (3)元明，公元 1279 -1528 年；
- (4)晚明盛清，公元 1528——1839 年；
- (5)清末、中华民国，公元 1839 年以下。

他说明第二周的时代之所以以朝代命名，盖因这一千五百多年历史在政治社会方面没有质的变化，大体只是沿袭秦汉的制度而已。一治一乱，一分一合，只是循环不已的单调游戏，改朝换代的平淡故事，“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近百年来，西学东渐，第二周中国文化已受到震荡，看来气数将尽，中国还能不能再创第三周文化呢？这正是战国策派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

“谈古”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论今”，史论即政论本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色，而战国策派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1940年4月，林同济在《战国策》创刊号上发表《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集中表述该派人物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可称为战国策派的宣言书。他认为当今世界的形态恰如中国二千年前的战国时代：“现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呢？干脆又干脆，曰在‘战’一个字。如果我们应用比较历史学的眼光来占断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我们不禁要拍案举手而呼道，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

林将战国时代的特征归纳为三点：第一，“战为中心”。即“战”不仅是该时代最严峻的事实，而且要成为一切主要社会行动的标准和大前提。第二，“战成全体”。即全体战成为时代的核心，成为民族的至上需求，民治政体如有碍于全体战，民治必须取消。第三，“战在歼灭”，此时战争的目的并非打败对方，而在于消灭对方，独霸世界。

他进而提出三点看法。首先，不是伟大就是灭亡，即不能战的国家就不能存在。其次，左右倾各派的争论意义全消，也就是说要停止一切意识形态方面的论争，建设道地的“战国式”国家，完成国家主义。再次，中国人必须改变传统的懒散态变，建立“战国意识”。所谓“大同可以为我们最后的理想‘战国’必须是我们下手的作风。”总而言之，‘战’与‘国’两字必须是我们此后一切思维与行动的中心目标。”

雷海宗的《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春秋与战国》，陈铨的《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何永佶的《龙虎斗》、《论国力政治》等文章均表述了类似的观点。他们此唱彼和，一时颇惹世人注目，也自然形成了所谓的

“派”。

### 三、几点启示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著书立说显然是为西方文明的命运担心，并企图开出治世良方。而形态历史学在中国的传人所忧虑的则是中国文化的存亡，芦沟桥的炮声使这种紧迫感更为强烈。“人类的大道所趋，竟已落于日本的蛮横行为来迫着我们作最后的决定——不能伟大，便是灭亡。我们更不得再抱着中庸情态，泰然抚须，高唱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生涯。”在战国策派看来，当今世界的文化形态已步入你死我活、竞争激烈的“战国时代”，中国文化却依然处于大一统帝国不死不活的局面，这是岌岌可危的事实。“中国文化的发展，早已错过了它的战国阶段而悠悠度过了二千多年的‘大一统’意识生活。我们中国人的一般思想立场，无形中已渗透了所谓‘大同’局面下‘缓带轻裘’、‘雍雍熙熙’的懒散态度。直到今天，我们还不免时时刻刻高提着‘大一统’时代的眼光来评量审定‘大战国’的种种价值。这点恐怕是我们最大的危险。”他们之所以大声疾呼建立“战国”意识，一个共同的动机，就是感到“目前中国所基本缺乏的乃是活力——个人缺乏活力，民族缺乏活力，我们尚可以提供些活力的鼓舞？。而“业已完成大一统阶段的古老中国文化，是否还有可能性摆脱一切；‘颓萎’色彩而卷土重来再创出一个壮烈的、活泼的、更丰富的体系？”这正是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

以雷海宗为例，他畅谈中国文化之两周，其着眼点却在于如问建设第三周中国文化。他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正如父母年迈，使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年迈的双亲依然健在，惧的是脆弱的椿萱不知何时会忽然折断。我们能有人所未曾有的第二周(文化)已是‘得天独厚’。我们是不是能创出尤其未闻的新纪录，去建设一个第三周文化(的伟局)？”

为了创造这“第三周文化”，雷海宗还写了《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中国的元首》中国的家庭》等文章，雷并不讳言这些史学论文无不带有现实的针对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兵可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说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三个问题若都能圆满地解决，建

国运动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

由此可见，在战国策派那里，史论即时论，历史与现实是二位一体的，他们用形态史观来研究历史，于是就有“中国的文化二周论”，他们用历史来比较现实，于是就有了“战国时代重演论”。在“战国”的大前提下，民治政体必须让路，更“不能有个人之硬挺挺的自由自在，也不能有阶级之乱纷纷争权夺利”，而要“将国内一切的一切置于这大事业(战争)的最高总驭之下。”林同济甚至说。“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这些原则原来不只是应付目前抗战局面而产生，；实在是配合全世界主潮而制定的。”这样，战国策派的史论也自然变成了政论，且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恰恰迎合了蒋介石借抗战之名加强其独裁统治的企图，力专制政权制造了学理上的根据，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受到进步学者的严正批判，指责他们是为法西斯的侵略和统治张目。无独有偶，当年，在西方也有人攻击汤因比是为希特勒的侵略制造理论根据，尽管事实未必如此。战国策派与其理论鼻祖受到相同的指责，这是否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呢？林、雷等人欲借“文化形态史观。来“经”当今之世，为中国所“用”，结果却落得个“法西斯买办文人”的骂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是咎由自取，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经世致用的抱负，但主观的“致用”往往造成客观的“被利用”，这也是林、雷等人的悲剧所在。

文化形态说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历史，自有其可取之处，但它往往只抓住历史的一些表面现象进行类比。斯宾格勒、汤因比的著作往往给人一种博大精深、气势逼人的感觉，但细读一下就会发现博大有余而精深不足，思想的深刻性与唯物史观是不可同日而言的。战国策派将文化形态说视为考古察今的不二法门，对唯物史观根本不屑一顾，他们食洋不化，机械套用西方观点。如“战国时代重演论”并非他们的发明，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早就说过，“我们的西欧—美国世界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间，也面临这种‘战国’的命运。”汤因比也有类似的看法。战国策派对文化发展的几千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描述，也与汤因比的观点大同小异。汤因比曾把大乘佛教作为古代中国文明与远东文明的媒介，认为中国文明至魏晋便趋于崩解，隋唐以后中国历史要纳入远东文明的体系。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二周论”显然就是这一观点的翻版。当他们用这种理论来考察世界政治之时，其结论则更为荒谬。

此外，近代以来对西方史学的介绍往往伴随着对传统史学的过激否定，战国策派也不例外。对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他们固然看不上眼，对司马迁以来的中国传统史学也是一概否定：严太史公是中国古代伟大史学消灭的象征，二千年来学术界对于司马迁的崇拜，正是二千年间中国没有史学的铁证。《史记》一书，根本谈不上哲学的眼光，更无所谓深刻的见解，只是一堆未消化的史料比较整齐的排列而已。后世的所谓史者，都逃不出此格式，甚至连史公比较清楚的条理也学不来，文化精神的衰退一泻千里，真可警人！”雷海宗甚至断言，五十年后，西方史学界也“必要呈现司马迁史的没落形态”。五十年后的今天，读到这些言论，难免令人哑然失笑。

客观历史是无限的，任何一种理论，纵然有十二分的可取之处，也难免有局限，战国策派却以唯我独是的态度将“文化形态说”视为解决古今中外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就必然导致非科学的结论。此外，从战国策派出史学也可看出，中国人介绍西方的史学理论目的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介绍内容的取舍又往往取决于介绍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地位，“介绍”时既然带有功利心“应用”时也难免会触及各社会集团的实际利益，以至是非蜂起。

尽管战国策派在介绍和应用形态历史观方面有种种负作用，但毕竟是他们首先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这种学说。汤因比的理论真正在欧美引起轰动是在1946年《历史研究》本出版之后，而早在1940年，林、雷等人已在中国的报刊上大谈其文化形态史观了，可见，当时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界的情况并不隔膜。有容乃大，能及时将一种西方史学理论介绍给中国历史学界，这便是对中国史学界的挑战，也无疑能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如雷海宗对“上古、中古、近代”式历史断限的质疑，在今天看来也不无道理。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学说不仅在西方的学术界，而且在社会、政治上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战国策派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如果把史学理论分为历史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理论，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学术界对前者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后者，西方的历史理论(如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韦伯等)在中国的市场远远大于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如兰克、郎格诺瓦、伯因汉等)。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消费对象只能是专业历史工作者，而历史理论的接受者却包括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界，它的影响不仅是学术的，而且是政治的、社会的。其实，即便是中国的专业史学



工作者，对西方历史哲学理论的兴趣似乎也大于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理论。这又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兴趣从来就不是纯学理的，所以，他们应用西方历史理论所撰述的学术文章也大凡带有干预时政的焦躁气。因此，尽管西方的历史理论“曲高”，而在中国的“和者”却始终不寡，其影响可以是积极的(如唯物史观)，也可能是消极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